

多维建构与整合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的历史考察

陈静^{1,2}, 徐立敏¹, 张金鑫^{1,2}

(1.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2. 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暨抗日战争史研究基地,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在华北敌后抗战格局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相较于晋察冀、晋冀豫及晋绥等较早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时间较晚,其创建过程经历了由鲁西北、冀鲁豫、湖西等独立区域逐步整合的特殊轨迹。在创建主体方面,包括冀鲁豫各地的地方党组织及八路军主力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等。研究这一独特创建模式,不仅能揭示华北抗战中局部战场与整体战局的互动关系,亦能深化对抗战史复杂性的认识,且还可以为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华北地区的实践逻辑提供微观样本。

[关键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6.01.006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26)01-0044-11

全面抗战时期,包括鲁西北、泰西、湖西、鲁西南及直南豫北等区域在内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既是华北的门户,又是联结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自古即为兵野频仍、风云际会的战略要地”^[1]。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匹配的是,目前学界对该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尤其对该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目前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等通史类著作的部分内容有所涉及外,还鲜见此方面的专题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作进一步的考察,以加深人们对相关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冀鲁豫地区的人民群众素有革命斗争的传统,在大革命时期就有党组织的活动。在土地革命时期,该区域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屡仆屡起。抗战前夕,在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下,该区域多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有的党员被捕,有的党员避走他乡,也有的党员进入潜伏状态,整体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状态。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区域各地党组织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号召下,积极进行各种抗日活动并迅速发展壮大。

一、鲁西北特委团结范筑先开创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鲁西北大致指黄河以北、津浦铁路以西的山东省所属地区,包括当时山东省第六区(治所为聊城)

所辖的“聊城、莘县、堂邑、冠县、阳谷、朝城、观城、濮县、范县、寿张、茌平、博平等12县”以及山东省第四区(治所为临清)所辖的“临清、丘县、馆陶、恩县、武城、夏津、禹城、平原、高唐、清平等10县”^{[1]89-90}。该地区系广阔的黄河冲积平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较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加以该地广大群众具有浓烈的抗日爱国情怀,此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及坚持对敌斗争的有利条件。

有一点须说明,鲁西北有专称和泛称之分,专称指当时山东省第四区(临清地区)所辖各县,泛称指当时山东省第四区(临清地区)、第六区(聊城地区)所辖各县。同时,鲁西也有专称和泛称之分,专称的鲁西主要指山东省第六区(聊城)所辖各县,泛称系指山东省境内津浦铁路德州至兖州段以西、济宁至菏泽公路以北一带,包括临清、聊城及泰西等地区。

1937年9月,日军大举侵略山东省。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榘命令国民党军队和官员向南撤退。在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霁之、中共鲁西北特委书记徐运北等派出的中共党员姚第鸿等人反复劝说、争取下,时任山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范筑先决定留下,与中共共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

(一)中共创建地方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1月,共产党员张维翰、王幼平及周紫珊

[投稿日期]2025-02-2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22BDJ048)

[作者简介]陈静(1974—),男,河北成安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根据地史、党史、抗日战争史及中国近现代史。

等人在山东省冠县创建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第十支队。为促进该武装的发展,中共鲁西北特委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将我党创建的一些游击队并入该支队,如将我党在冠县、寿张等地创建的游击队并入该支队;二是收编当地游杂武装,如收编冠县、馆陶县的地方民团;三是筹集经费,购买武器弹药,如该支队成立之初,曾从国民党军队中购买机枪15挺、子弹2万发;四是分配一批红军干部到该支队担任领导职务,并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上述工作的实施,尤其是派遣红军干部及按照红军的建军原则建立政工制度,极大地促进了该支队的发展,短短数月(截至该年度8月份),该支队已发展至四五千人的规模,成为中共在鲁西北地区坚持对敌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共领导的第十支队的创建及积极开展对敌军事斗争,对坚定范筑先的抗日决心及推动鲁西北抗日形势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 协助范筑先改编各种地方游杂武装

中共鲁西特委在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同时,还以极大精力协助范筑先改编各种游杂武装。国民党主力部队南撤后,在鲁西北出现大量的地方游杂武装,这些游杂武装的性质大致有以下几种:一为地方保安队,如山东省第六区及第四区保安营;二为国民党主力部队南撤后留下的溃散及残存的部队,如西北军刘汝明部骑兵团残部等;三为地方民团,如堂邑等县的民团武装;四为绿林武装,如范县袁寿山等绿林武装。1938年5月,为统一指挥鲁西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我党积极协助下范筑先将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扩建为由范筑先任司令员的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将散布在鲁西北的上述游杂武装统一收编为由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统辖的35个支队、3路民军及一些独立团、营,人数约6万人。上述收编工作使鲁西北的游杂武装暂时得以形式上的统一,也使得当时鲁西北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有所扭转。

需指出的是,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收编的武装力量中,除第一保安营等极少数直属部队外,多数仅接受番号改编,形成“名义统属—实际自治”的指挥格局。其领导者多为国民党旧军官和地主士绅等,改编后仍掌握部队实权。虽部分支队配备中共党员担任副职或从事政治工作,但受限于游杂武装成分复杂、中共党员在其中工作时间较短等结构性因素,多数武装未能实现革命性改造,普遍存在纪律松散、军事素养低下等问题。在抗战初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上述游杂武装基于存续发展需求,尚能接

受范筑先的统一调度;但由于缺乏共同政治纲领与组织纽带,其联合本质上仍属松散的军事联盟,一旦面临复杂局势或利益冲突,便迅速暴露其派系分立的脆弱性,为后期这些武装力量的分化瓦解埋下伏笔。

(三) 创建抗日政权

日军侵略山东省后,鲁西北原国民党政权瓦解,社会秩序混乱。针对上述局面,中共鲁西特委协助范筑先重建了包括山东省第六区的12个县、山东省第四区10个县及黄河两岸山东省第一区、第二区部分县在内的共30余县的抗日政权。上述各县中,由中共党员担任县长的有濮县、观城、寿张、莘县、冠县、高唐、范县及阳谷等。上述各县抗日政权创建后,积极为抗日武装提供后勤服务,推动了抗日形势的发展。

全面抗战逾一年间,中共鲁西北党组织与范筑先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作关系,积极实施对日作战,相继取得梁水镇、柳林等地战斗的胜利,成功开辟鲁西北抗日游击根据地。1938年11月15日范筑先殉国后,以其个人声望为纽带维系的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所属武装力量迅速分化:部分部队投敌叛国,部分依附于国民党顽固派李树椿(时任国民党鲁西行署主任)、王金祥(时任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集团,经中共争取整编的仅为少数。此一变故导致鲁西北抗日阵营解体,该区域抗战局势再度陷入混乱之中。

二、中共地方党组织独立自主开创泰西抗日根据地

泰西地区系指“津浦铁路泰安段以西,京杭运河以东,黄河以南,汶上、宁阳以北地区,包括泰安、肥城、长清、平阴、东平、东阿、汶上、宁阳等县”^{[1]120}。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共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制定“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2]的抗日方针。1937年9月,中共北方局在太原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今天华北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广大地组织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3]。

山东省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北方局的方针政策,动员各地党组织“全力以赴组织人民武装,发动抗日游击战争”^[4]。在上级机关的领导和指示下,泰西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积极开展对敌军事斗争。

(一) 创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1938年1月,正值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在党的抗日方针指引下,山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11日,共产党员张北华、远静沧等遵照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在泰安夏张镇发起武装起义,正式组建山东省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张北华任主席,远静沧任政治部主任,初建时队伍规模达100余人。该自卫团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自成立伊始便积极投身对日作战。1月下旬,成功实施奇袭肥城县城行动,缴获步枪20余支,首战告捷;2月中旬,又在津浦铁路沿线开展破袭战,拔除日军界首据点,歼灭日军30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这些胜利产生了显著的政治动员效应,极大地鼓舞了泰西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当地青壮年踊跃报名加入抗日武装。至1938年3月底,自卫团迅速发展壮大,下辖17个大队、1个先锋连及1个特务队,总兵力达2700余人,成为泰西地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核心抗日武装力量,构建了该区域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框架。

与此同时,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另一重要武装力量也在蓬勃发展。1938年2月,共产党员陈伯衡、刘星等在汶上县积极发动群众,组建起一支100余人的抗日自卫队。该武装成立后,主动出击日伪军,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袭击汶上县第五区伪区公所,摧毁伪政权基层统治;在汶上城东白塔村设伏,歼灭伪军50余人;于东平县韩山头、麻子峪地区与日军展开游击战,毙伤日军20余人。这些军事行动有效遏制了日伪军的扩张势头,极大提振了民众抗日信心,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随着群众参军热潮的兴起,至1938年4月,该自卫队规模扩展至1000余人,成为泰西地区党领导的又一支重要抗日武装,与山东省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形成犄角之势,共同奠定了泰西抗日根据地的武装基础。

(二) 创建及发展党的组织

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建立了由段君毅任书记的泰西特委。泰西特委成立后,重点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创建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泰西特委成立时,泰西只有东平县一个县有县工委组织,该特委成立后,除将东平县工委改建为县委外,还迅速在长清、泰安、肥城、平阴、宁阳、汶上成立党的县委组织。在此基础上,在一些乡村还建立村党支部。二是在部队中发展党的组织。泰西抗日武装虽然发展较快,如自卫团在不到6个月时间内即发展到近3000人,但该自卫团仅有少量党员,且没有党组织。为提

高泰西抗日武装的战斗力,泰西特委从党建入手,按照红军“支部建在连上”的政治建军制度,在部队中成立党的各级组织,发展各级指挥员及基层班长、战士入党。另外多次举办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大量的政工干部。上述措施的采取,使部队的政工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广大指战员思想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大大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三) 组建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

日军大举侵略山东后,泰西地区的国民党政权纷纷瓦解,政府权力处于“真空”状态。为改变以上状况,中共泰西特委在该区域创建了半政权性质的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

在中共泰西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下,泰西各县、区抗日动员委员会承担了一些具有政权属性的工作。作为抗战初期党的重要动员组织,泰西各级动委会发挥着双重职能:一方面通过召开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救亡宣传队等形式,广泛传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动员适龄青年加入抗日自卫团、农民自卫队等地方抗日武装,有效巩固了抗日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建立战时物资征发与调配机制,通过动员爱国士绅捐赠、合理征收救国公粮等方式,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筹措物资给养,保障了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物资需求。

这一时期,中共泰西特委正处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探索阶段。受初创时期经验不足限制,其对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规律的认识尚不深入和成熟,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抗日武装建设与党组织发展,对政权建设的系统性规划有所滞后,未能及时在动委会基础上建立正式抗日民主政权。这一阶段性局限在1939年八路军主力部队东进泰西后得到迅速解决,此后,随着政权建设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泰西地区逐步建立起体系化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泰西地区的党组织在山东省委的领导和帮助下,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不断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建党整军,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使泰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截至1939年3月,泰西地方党组织独立自主开辟的泰西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三、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部分主力、第一一五师主力东进冀鲁豫

为改善冀鲁豫地区对敌军事斗争形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八路军第一

二九师部分主力及第一一五师主力相继向东挺进,进入冀鲁豫地区。

(一) 第一二九师部分主力挺进鲁西北

1938年11月范筑先牺牲后,鲁西北陷入极度混乱之中。为扭转上述形势,1938年12月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领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等部队东进至鲁西北地区。12月24日,上述部队先是歼灭顽杂王来贤部1000余人,继而攻克了高唐县城,粉碎了鲁西北顽杂部队企图切断中共领导的鲁西北与冀南抗日武装之间联系的计划,初步稳定了鲁西北的抗日局势。

刘伯承、邓小平到达冀南后,在威县召开冀南、鲁西北地区军政干部会议,该会议确定了依靠群众,依靠乡村,巩固冀南和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会后,为加强鲁西北的抗日力量,第一二九师在冠县成立由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为进一步加强先遣纵队的力量,1939年1月14日,第一二九师将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划归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指挥。

1939年3月,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等部队返回太行山区,先遣纵队留在鲁西北,坚持该地区的对敌斗争。3月以后,为改善对敌军事斗争形势,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实施分区活动,先遣纵队进入运河东活动,筑先纵队在卫河两岸坚持斗争。此后,在第一二九师的直接领导下,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先后取得俎店、陈贯庄及魏二庄等战斗的胜利,对敌军事斗争形势日趋好转。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逐渐好转,冠县、馆陶、邱县、临清、茌平、博平等县抗日民主政府相继建立,截至1939年9月,第一二九师领导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二) 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东进运西、泰西地区及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东进直南豫北及鲁西南地区

运西地区系指“京杭运河以西,以山东鄒城为中心的鄆城、巨野、菏泽(北部)、嘉祥、濮(县)南、汶(上)西、东平(西部)、寿张(南部)一带”^{[1]177}。直南豫北及鲁西南地处冀鲁豫三省的结合处,被称为小冀鲁豫,其中直南区域为“河北南端,河南与山东中间的狭小地带,包括大名以南的南乐、清丰、濮阳、东阳、长垣等5县”,豫北地区“包括内黄、滑县、浚县、安阳等县”,鲁西南地区“系指成武、定陶、金乡、菏泽、巨野、曹县、单县等地”^[5]。

为增强中共在上述地区的抗日力量,1938年11

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罗(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师部及陈旅(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6],1938年12月2日,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命令“一一五师直及三四三旅之五、六两团,由你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及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领开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7]。

奉以上中央军委的指示及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的命令,1939年3月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由晋西东进至运西、泰西地区。1939年2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第三四四旅一部东进至直南豫北地区,3月,杨得志、崔田民将先期到达直南豫北、鲁西南的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等部与当地我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上述部队东进后,不仅取得樊坝、陆房、梁山等战斗的胜利,而且通过常庄会议、泰西军政联合会议等会议的召开,为运西、泰西、直南豫北及鲁西南等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建设,制定了所急需的指引型方针政策。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及第三四四旅的东进,促进泰西、运西、直南豫北及鲁西南地区党、政、军、群各项工作迅猛发展,截至1939年底、1940年初,不仅泰西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而且开辟了运西及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包括直南豫北及鲁西南地区),极大地改善了上述地区对敌斗争形势。

(三) 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东进湖西地区

湖西地区系指“微山、昭阳、独山、南阳四湖以西,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主要包括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工委合并后所领导的地区:江苏省所属的丰县、沛县、铜(山)北,山东省所属的金乡、鱼台、嘉祥、单县、巨(野)南、成武,安徽省所属的萧(县)北、砀(山)北,河南省所属的虞城等县。萧(县)宿(县)永(城)地区,邹(县)西、滕(县)西及沛(县)滕(县)边地区,亦属于湖西地区领导”^{[1]150}。

需说明的是,湖西区与鲁西南在山东境内有6个交叉的县份,即金乡、鱼台、嘉祥、单县、巨野、成武,在一些文献资料中提到湖西区的范围时包括上述6县,提到鲁西南地区的范围时也包括上述6县。

随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及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等地的创建与发展,中共中央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执行此战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奉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晋西出发,于1938年12月

到达湖西地区。

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后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改编苏鲁豫支队,改编后的苏鲁豫支队在湖西党组织及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苏鲁豫结合地带的数十县连战皆捷,截至1939年底,歼灭日伪万余人,部队发展到近万人。由此,打通了“华中与华北两大战略区的联系”,完成了“创建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任务”^{[1]200},顺利完成中央军委及八路军总部交付的战略任务。

八路军主力部队东进冀鲁豫地区后,通过多次对敌作战的胜利,有效扭转了区域内的敌我斗争态势。在抗日根据地创建实践中,主力部队对地方党组织及地方武装实施系统性指导与协同建设,显著提升了后两者的军事素养与政治水平,同时自身力量也得以迅速扩充。这种主力部队、地方党组织及地方武装的良性互动机制,不仅形成了又一重要敌后战略区域,更从整体上强化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为优化敌后战场的战略布局提供了典型范例。

四、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由分散走向统一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的不同,冀鲁豫所属各地区的党、政、军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分散领导的状态,后随着对敌斗争形势发展,开始逐渐走向统一领导。

(一) 党的领导

由于冀鲁豫各部分具体环境的不同,直南豫北、鲁西、鲁西南、湖西等地区的党组织曾分别接受过河北省委、山东省委、河南省委等上级党组织的领导。

1. 直南特委的建立

1937年10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成立,由刘大凤担任负责人,负责特委的重建工作。1937年11月,“中共直南特委在清丰县正式成立”,朱则民任书记,刘大凤任副书记,“负责大名、南乐、清丰、濮阳、内黄、滑县等县党的恢复发展工作”^[8]。1938年6月,朱则民调任冀鲁豫边区省委宣传部长,王从吾接任直南特委书记。1938年10月,直南特委领导范围为直南豫北的清丰、南乐、大名、东明、滑县、濮阳、内黄等7个县,在党的组织关系上,归中共冀南区党委(1938年8月前称为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直南特委的正式成立及此后人事、组织隶属关系的调整,规范了该区域党的组织工作,有力推动了该地区抗日活动的开展。

2. 鲁西区委员会的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组织部部长张霖

之以省委代表的身份统一领导鲁西北党的工作,在张霖之的主持下,中共鲁西特委和鲁西北特委合并为新的鲁西特委,赵健民任书记,合并后的新鲁西特委统一领导山东省第四区、第六区所辖各县的党组织工作。1938年6月,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中共鲁西特委又分建为鲁西特委和鲁西北特委,徐运北任鲁西特委书记,张承先任鲁西北特委书记。分建后的鲁西特委主要领导聊城附近各县党的工作,鲁西北特委主要领导临清附近各县党的工作。

根据山东省委的决定,中共泰西特委于1938年5月成立,段君毅任特委书记,张北华任军事部长兼自卫团主席。该特委成立后,统一领导泰西地区各县党的组织。

1939年1月15日,由张霖之任书记的中共鲁西区委员会在馆陶县成立,统一领导鲁西、鲁西北、泰西3个特委。由此,上述三个地区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

3. 苏鲁豫特委的建立

1937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郭子化派人与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河南省委派刘文等人到鲁南,11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进行调整,郭子化仍任书记,刘文以中共河南省委代表身份参与特委的领导工作。同时,特委决定由张光中负责徐(州)西北区的湖西各县党的工作,徐(州)西北区是指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西,包括原江苏省徐州专署所辖的丰县、沛县、铜山、萧县、砀山(以上两县现属安徽)等县。1938年4月,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在丰县设立徐西北区委,王文彬担任书记,领导丰县、沛县、萧(县)北、砀(山)北、铜(山)北等地党的工作。

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建立由白子明任书记的鲁西南工委,领导鲁西南地区党的工作。1938年5月,鲁西南工委改称鲁西南特委,白子明仍任书记,工作范围未变,仍旧负责鲁西南各县党组织的工作。

1938年7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将徐西北区委和鲁西南特委合并为中共苏鲁豫特委,王文彬任书记,白子明任组织委员。合并后的苏鲁豫特委统一领导湖西、鲁西南地区党的工作,特委活动中心位于丰县、沛县及鱼台县,领导范围包括“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铜山、宿县、金乡、嘉祥、鱼台、单县、曹县、东明、考城、沛滕边等22县”^[9]。

以上可看出,与敌后战场的动态演进相适应,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通过优化整合逐步实现了党组织领导体系的规范化与统一化。此种动态调整机制不仅满足了反“扫荡”的军事需求,而且为抗日根据地的

持续发展提供了组织制度上的保障。

(二) 各地抗日政权依次建立和走向统一领导

全面抗战爆发后,冀鲁豫各地的党组织先后建立起一些抗日政权,随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这些分散建立起来的抗日政权逐渐实现了统一的领导。

1. 鲁西北、泰西抗日政权的建立和统一

1938年底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鲁西北,该部队的到来加强了我方的军事力量,改善了对敌斗争的形势。随着军事斗争形势的好转,在鲁西北的冠县、馆陶、邱县、莘县、堂邑、临清、朝城、阳谷等县先后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鲁西北行政委员会在馆陶县成立,张维翰任主任,荆汉杰任副主任,该委员会的成立统一了鲁西北黄河以北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

1939年6月,泰西区长清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9月,肥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随后,东平、宁阳、平阴、汶上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也先后成立。1939年10月,在以上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泰西行政委员会,段君毅任主任,张耀南任副主任。该委员会的成立,统一了鲁西黄河以南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

1940年4月,鲁西北、泰西两个行政委员会合并为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肖华任主任,段君毅任副主任,刘铁之任秘书长,下辖泰西专署、运西专署、运东专署及鲁西北专署。上述公署的成立统一了鲁西各县抗日政权的领导。

2. 直南豫北抗日政权的建立和统一

1940年,在直南豫北地区,先后建立了内黄、清丰、南乐、大名、长垣、滑县、濮阳、东明等抗日民主政府。4月17日,在上述抗日民主政府建立的基础上,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成立,安法乾担任专员,晁哲甫担任参议室主任。该公署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两地区抗日政权的领导。

3. 湖西抗日政权的建立和统一

1939年11月,湖西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开始取得较大进展。首先在该地区恢复了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完善了具有抗日民主政权性质的沛(县)滕(县)办事处,接着又成立了邹县抗日民主政府,随后金乡、单县、丰县等县的抗日民主政府也相继成立。在以上各县抗日政权建立的基础上,1940年7月,湖西专署成立,李贞乾担任专员。该公署的成立,统一了湖西各县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

(三) 鲁西、冀鲁豫军区的成立

在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冀鲁豫地区之前,该地区的抗日武装多由各地党组织分散领导,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整合各地武装、建立统一指挥体系成为迫切需要。1938年至1940年间,八路军主力陆续进入冀鲁豫地区,并先后推动成立了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这两个军区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冀鲁豫地区军事体系由分散走向整合,也反映出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进军事制度建设的系统实践。然而,这一整合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面临着组织结构复杂、作战习惯差异及指挥系统转换困难等挑战。

1. 鲁西军区的成立

为加强地方武装的统一领导,1939年8月鲁西军区成立,由第一一五师独立旅兼鲁西军区,旅长杨勇兼任军区司令员,副旅长段君毅兼任军区副司令员。军区成立之初,下辖两个军分区: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兼第一军分区(泰西军分区),独立旅第二团兼第二军分区(运西军分区)。鲁西军区的建立,初步统一了运西、泰西地区的军事指挥,为整合区域内各抗日武装奠定了组织基础。

然而,整合过程中亦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困难及挑战。一方面,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组建领导的地方武装在组织结构、人员构成和作战习惯上存在差异,部分地方武装长期处于独立发展状态,对统一指挥一时还不太适应。另一方面,各地区抗日斗争发展进程不一致,增加了协调各地区武装力量、实现统一对敌作战的难度。为解决这些困难,鲁西军区采取了“主力部队兼任军区领导”的方式,既强化了指挥权威,也通过人事融合促进了不同系统干部之间的协作。杨勇、段君毅等领导人注重团结地方干部,尊重原有地方武装的特点,采取渐进式整合策略,从第一一五师中选派军事政治干部帮助第六支队等地方武装进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此外,第一一五师还带领第六支队等地方武装进行联合作战,在战斗中帮助地方武装提升作战能力,以此逐步将地方武装纳入军区统一的编制与统一的作战序列,从而增强了该区域抗日武装的整体战斗力。

2. 冀鲁豫军区的成立

1940年4月,黄克诚率领在太行山南部地区的八路军第二纵队独立游击支队、华北抗日民军第一旅等部队进入冀鲁豫地区,与该地区原有武装冀鲁豫支队合编为新的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冀鲁豫军区,由第二纵队兼冀鲁豫军区,黄克诚兼任军区司

令员,崔田民兼任军区政委,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冀鲁豫军区下辖第一(直南)、第二(豫北)、第三(鲁西南)3个军分区,各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皆由第二纵队所属主力部队首长兼任。冀鲁豫军区的成立,统一了直南豫北及鲁西南的军事指挥和领导。

冀鲁豫军区的成立,标志着更大范围的武装整合与指挥统一。然而,这一整合过程同样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来自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主力与冀鲁豫本地武装在作战经验、组织管理上存在差异,合编初期出现了指挥系统转换、资源重新调配困难等问题。其次,不同区域的干部在战略发展方向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的主张。为统一思想和行动,军区领导层针对地方武装熟悉当地地理、民情的特点及第一一五师主力经历长征、英勇善战的长处,采取了多项措施,使得外来的第一一五师与当地武装得以快速融合,比如:在组织架构上实行“纵队兼军区”体制,既保持主力部队的机动性,又兼顾地方武装的特殊性;在干部配备上注重地域平衡与优势互补,通过组织整编、联合作战提升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当地武装与外来的主力部队进行混编,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增进相互间团结与协作。

总体而言,鲁西、冀鲁豫地区外来的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与当地地方武装在整合的过程中总体呈现出融洽良好的状态。在互相尊重、彼此支持、团结和睦的氛围中,双方有效推动了武装力量的整合与战斗力的提升。外来主力部队与当地武装及不同区域干部在整合过程中展现出了高度团结协作精神,堪称当时各抗日根据地的典范。这既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显著优点,亦是其鲜明特点,同时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进步性。

鲁西、冀鲁豫军区的相继建立及其对辖区内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不仅体现了敌后抗日武装从分散走向整合的发展历程,更深刻反映了中共在军事制度建设中的系统性探索。面对组织管理复杂、作战习惯的差异及指挥系统转换困难等问题,两个军区通过实施优化组织架构、统筹人事安排与加强思想政治与纪律教育等措施,逐步实现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的有效协同。这一历史实践,不仅提升了抗日根据地的整体作战能力,也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体制的规范化与统一化积累了重要经验。

在以上各地区的党、政、军系统实现统一领导的基础上,1941年7月,冀鲁豫(亦称小冀鲁豫,包括直南豫北及鲁西南地区)和鲁西两区合并,仍称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湖西划归冀鲁豫边区)。至此,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现了党、政、军系统集中统一的领导。

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党、政、军走向统一领导的进程中,抗日政权的创建工作显著滞后于党的建设与军事武装建设工作。这一现象既源于抗战初期敌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客观劣势,也源于当时地方党组织及地方武装对抗日根据地创建规律以及抗日政权创建的战略价值存在认知偏差。此种认知偏差在主力部队的系统性指导下得到及时纠正,此后各地抗日政权在党建引领与军事保障的协同作用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政权创建的纠偏过程,也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将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与华北敌后抗战实际相结合的认知深化过程。厘清这一历史脉络,有助于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的全面把握和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独特创建特征的深刻领会。

五、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特征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华北敌后抗战格局中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此种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多元主体协同创建

与由八路军主力部队独立开创的晋绥、晋冀豫、晋察冀及冀南等抗日根据地显著不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路径呈现出鲜明的多元主体协同特征。前者多以单一主力部队为核心力量进行开辟与建设,如晋绥抗日根据地由第一二〇师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由第一二九师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一一五师的一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由第一二九师的一部创建。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则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战略部署下,由中共地方党组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九师等多部主力与地方武装及群众力量等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构建而成。

1. 此种多元主体包括以下几个组织

(1)中共地方党组织

全面抗战爆发后,直南和豫北、鲁西、泰西及鲁西南和湖西等地党组织,分别在中共平汉线省委、山东省委及河南省委等党组织领导下,宣传、发动及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北方局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发动游击战争的指示,积极恢复、整顿与重建党的组织,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建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和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使抗日的烈火燃遍了冀鲁豫各个区

域。通过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冀鲁豫各地党组织初步创建了规模不等的抗日根据地与游击区,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全域化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中共创建和领导的地方武装

中共党组织在冀鲁豫沦陷后创建了多支抗日地方武装,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1937年10月,直南中共党员刘大风等人创建的抗日民军第四支队;1938年1月,鲁西北中共党员张维翰、王幼平等创建的第十支队;1938年1月,泰西中共党员张北华、远静沧等人创建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1938年6月,湖西区中共党员李贞乾、王文彬等人创建的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除了这些较大的地方武装外,还有规模较小但数量众多、散布于冀鲁豫各区域的县、区乃至村抗日武装,如濮县抗日游击队、东明县王浩屯区抗日自卫队及微山湖西岸南庄抗日自卫团。这些规模大小不等的地方武装,熟悉地方情况,与当地群众联系紧密,保家卫国的情绪强烈,对日军的战斗多次取得胜利(如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获奇袭肥城县城、拔除津浦铁路日军界首据点等战斗的胜利)。因此,这些地方武装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八路军多支主力部队

为创建鲁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12月21日,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率该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至冀南、鲁西北地区的威县、馆陶、冠县、朝城一带。此后,第一二九师在冠县创建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该纵队成立后,不仅指挥本纵队的部队,还统一指挥先期进入鲁西北地区的第二二九师青年纵队第三团及第一二九师骑兵团等部队。为进一步加强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1939年1月,第一二九师在馆陶县创建筑先抗日纵队。此后,在第一二九师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第三八六旅主力、先遣纵队、筑先纵队及青年纵队第三团及第一二九师骑兵团等部队在鲁西北地区对日作战取得多次胜利,对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39年3月2日,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师直属部队和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等部近5000人(代号为东进支队)进入鲁西地区。1938年12月,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独立团进入直南地区,同时,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一部进入鲁西南地区并与当地武装合编为第三四四旅特务团。1939年2月16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旅直属部队工兵排、炮兵排和部分一部到达直南、豫北地区,3月9日,在

濮阳井店与第三四四旅独立团、特务团等部队整编为冀鲁豫支队。1938年12月27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进入湖西地区。上述部队东进冀鲁豫地区后,对敌作战多次取得胜利,迅速改善了所在地区的对敌斗争形势。截至1939年底,运西、湖西等地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主体的复合性特征,本质上是中共在复杂战略环境下实施“多维创建”策略的必然产物。这种不同于传统模式的创建路径(单一主力部队创建某个抗日根据地),不仅丰富了敌后抗战的组织形式,更在军事政治实践中发展出具有创新价值的抗日根据地创建经验。

(二)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辟时序的滞后性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在时间维度上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特征。从历史时序方面考察,华北其他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及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在1938年即完成战略开辟,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从整体上来看直至1939年之后才进入系统化创建阶段。

对于滞后的原因,一是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逻辑遵循“敌占我创”的空间置换规律。日军对华北地区的战略推进具有明显的时序梯度,1937年“七七事变”后,侵华日军沿同蒲、平汉、津浦铁路实施由北向南的纵深突破,至1937年底已完成对河北、山西两省主要区域的军事控制。相较之下,冀鲁豫地区的全面沦陷始于1938年春季,其部分区域沦陷时序较晋绥、晋察冀等区域晚半年左右。这种由日军军事推进节奏所主导的区域沦陷时序,构成该抗日根据地创建较晚的时序性前提制约。二是中共军事战略重心的阶段性转移。1937年11月太原失守至1938年底期间,中共在华北的军事力量主要致力于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及冀南四大战略支点的构建。随着1938年秋武汉会战的结束,上述抗日根据地已形成相对稳固的战略支撑点。基于扩大华北抗日根据地及打通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等战略考量,中共中央适时调整战略布局,决定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并派遣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一部与第一一五师大部主力实施战略东进。这种军事力量的跨区域投送与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成为影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进程的核心因素。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开辟时间较晚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党内思想认知的转变和统一过程较为艰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大片平原为主,多数地区为开阔的黄河冲积平原,其创建与发展的关键前提在于

党内战略认知的逐步统一。抗战初期,受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红军依托山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经验影响,党内存在一种经验性和习惯性认知,普遍认为抗日根据地的构建应聚焦山区,对平原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随着冀中、冀南等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党内对平原游击战争的认知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在鲁西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系统阐释了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可行性。他的论述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为指导,结合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实践经验,构建了较完整的平原抗战理论体系:平原虽无山地屏障,但动员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可构成“铜墙铁壁”式的战略防线;其广阔的平坦地域虽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机动,但也为八路军的战术迂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且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可为抗日根据地的存续提供坚实支撑。罗荣桓明确指出,只要坚持群众路线、推行正确政策并开展地形改造,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便具备充分可行性。

此次会议成为冀鲁豫地区战略认知达成统一的重要节点,党政军民达成了创建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共识。此后,各地党政军民开展大规模破路运动与地形改造运动,通过挖掘抗日沟等方式重构战场地形环境,迅速掀起平原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高潮。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上述时空特征,既反映出敌后抗战战场的演进规律,也展现出中共军事战略的动态调整机制,为研究抗日战争中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时空规律提供了另一典型样本。

(三)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的阶段性特征

1. 地方党组织主导的战略奠基阶段(1937年10月—1938年12月)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洛川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在此背景下,直南豫北、鲁西北、泰西及湖西等地区的地方党组织,依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迅速展开敌后抗战活动。各地方党委通过“抗日自卫队”“青年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创建抗日武装,积极对敌作战。至1938年底,初步形成了若干具有战略支点意义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为后续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战略推进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主力部队协同发展阶段(1939年1月—1940年4月)

1939年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一部、第一一五师大部主力等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相继东进至冀鲁豫地区。主力部队的到来标志着抗日根据地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通过对敌作战的多次胜利,迅速改善了该区域对敌军事斗争的形势;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濮县、范县、夏津、清丰、南乐、曹县、金乡、丰县等抗日民主政府相继成立。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在此前地方党组织创建的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的基础上,极大地巩固、加强及扩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此种阶段性创建模式体现了中共在敌后抗战中的战略智慧。在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初期阶段,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的地缘优势,通过发动群众性游击战争,建立一些战略性支点;当主力部队到达后,迅速实现军事力量整合,形成“地方党组织奠定基础+主力部队拓展巩固”的良性互动机制。这种“两步走”战略既符合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抗日根据地创建的理论阐述,又创造性地解决了敌后战场某处区域暂时没有主力部队而又需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现实问题。

(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路径具有显著的合并发展特征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空间演进呈现出独特的合并扩张模式,通过1940年鲁西北与泰西区合并、1941年冀鲁豫与鲁西区合并、1942年湖西区划入冀鲁豫边区三次重大区划调整,实现了战略空间的整合重构。这种动态演进过程既反映了中共在敌后抗战中的战略智慧,也体现了复杂地缘环境下抗日根据地创建的客观规律。

1. 初期整合阶段(1940年):鲁西北与泰西区合并

随着鲁西北、泰西等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战略区位直接构成对日军控制的平汉、津浦、陇海三大铁路干线的严重威胁。为维系战略交通安全,华北日军1940年4月启动第一期“治安肃正”计划,泰西等抗日根据地被列为重点“扫荡”区域。华北日军经统一战略部署,集结优势兵力,对鲁西北等抗日根据地开展频繁“扫荡”与突然袭击。自此,冀鲁豫区域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对敌斗争压力呈逐步加剧之势,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日趋严峻。

1940年4月,为应对日军“扫荡”压力,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将鲁西北行政区与泰西行政区合并,

组建鲁西行政主任公署。这次合并具有显著的军事防御导向,两区合并后形成横跨运河东西两侧及旧黄河南北两侧的战略防御格局,加大了南北的战略纵深,形成“泰鲁边”战略区,有利于对敌军事斗争的开展。

2. 战略重构阶段(1941年):冀鲁豫与鲁西区合并

自1941年起,华北日军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根基,对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实施分割包围与严密经济封锁,推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导致敌后抗战局势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华北日军相继发起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辅以数百余次“扫荡”“清剿”“蚕食”等作战行动,构建起系统性军事压迫体系。日军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及腹地增设千余处据点,修筑数千公里公路与封锁沟,形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网络,将抗日根据地切割为数十块孤立区域。军事切割及经济封锁严重影响抗日根据地物资流通,加以连年干旱引发的自然灾害,民众生存境遇陷入极端困境。多重危机交织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步入抗战最艰难阶段:1941年抗日根据地面积较1940年缩减约1/3,经济濒临崩溃,民生凋敝,形成敌祸与天灾叠加的严峻态势。

为坚持冀鲁豫、鲁西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7月1日,冀鲁豫、鲁西两地区委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委,7月7日,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原鲁西军区、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9月初,鲁西、冀鲁豫各界代表选举产生冀鲁豫行政主任公署。此后,由该区域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党政军委员会也随之产生。冀鲁豫与鲁西的战略重组,加强了对敌军事斗争的力量,对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功能优化阶段(1942年):湖西区整体划入

湖西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初创后,虽隶属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但其在创建过程及对敌斗争中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一直存在紧密的联系。该抗日根据地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坐落于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干线交汇形成的三角地带,核心区域处于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以西的地带。从地缘格局来看,其隔南阳、独山、昭阳、微山四湖与鲁南抗日根据地相望,西接直南、豫北抗日根据地,北连泰西、运西抗日根据地,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形成天然的地理与战略联结。

1942年10月,湖西区正式划归冀鲁豫边区,这一行政区划调整具有鲜明的战略资源整合属性。一方面,湖西区的划入显著拓展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的南北纵深,南阳湖等湖泊及周边湖沼地带构成天然战略缓冲区,有效提升了抗日根据地的防御稳定性;另一方面,此次战略调整达成关键性突破:湖西地区作为联结华中与华北的战略枢纽,成为经山东、太行通往延安的核心交通廊道。该交通线承担党内重要文件传递与骨干干部护送等核心职能,刘少奇、陈毅等党和军队重要领导人皆经此安全奔赴延安。其不仅保障了延安党中央与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纵向指挥联络,更成为抗战时期战略决策传递、区域抗战人员物资统筹的关键支撑,深刻影响全国抗战整体格局和走向,凸显出不可替代的军事与政治战略价值。

上述空间整合呈现三大特征:一是合并动因的层级性,从应对军事威胁到优化资源配置,再到构建战略交通枢纽;二是整合方式的渐进性,经历局部合并、区域合并的发展过程;三是空间形态的网络化,通过贯穿平汉、津浦、陇海铁路的“两纵一横”交通走廊,形成贯通延安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的敌后交通网络。

此种合并扩张模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一是在军事防御上,扩大了该抗日根据地东西、南北的战略防御纵深,形成“山地—丘陵—平原—湖泊”四位一体的立体防御体系,扩大了对敌军事斗争的回旋空间;二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了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使抗日根据地人口与面积得以大规模提升,增强了对敌斗争的整体力量。此种扩展模式表明,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能够通过灵活的空间重组策略,有效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从而逐渐争取到抗日战争的主动权。

“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10],正是基于对上述辩证唯物论的正确认识和运用,在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中共成功探索出多维创建、阶段性创建与整合发展的独特创建路径。此种创新路径不仅与整个中国抗日战场的战局存在紧密关联,而且高度契合抗日战争的整体态势,并对抗战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深入认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实践和理论上的独特路径,不仅能够深化对抗战史复杂性的理解,还有助于从逻辑层面加深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参考文献

- [1]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
-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一九三六——一

- 九三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316.
- [3]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80-81.
- [4]黎玉.黎玉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07.
- [5]第二野战军战史编委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69.
-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441.
- [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辑组.八路军·文献[M].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4:265.
- [8]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邯郸历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101.
- [9]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晋冀鲁豫根据地大事记(1937—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40.
-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13.
- [责任编辑 金 钊]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he Hebei-Shandong-Hena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ase Areas

CHEN Jing^{1,2}, XU Limin¹, ZHANG Jinxin^{1,2}

(1.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2. The Research Base on The 129th Division, the Jin-Ji-Lu-Yu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andan, Hebei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ebei-Shandong-Hena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ase Areas presented distinct uniqueness in the pattern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ehind enemy lines in North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earlier-established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ase Areas such as Shanxi-Chahar-Hebei, Shanxi-Hebei-Henan, and Shanxi-Suiyuan. The Shanxi-Hebei-Henan Base Area was established relatively late. Its establishment process went through a special track of gradual integration of independent regions such as Northwest Shandong, Hebei-Shandong-Henan, and Western Shandong Lake Area. In terms of its founding forces, they included not only the main force units of the 115th and 129th Divisions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but also the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of Hebei, Shandong, and Henan. In this sense, studying this unique establishment model can not only reveal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ocal battlefields and the overall war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but als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oreover, it can provide a microscopic sampl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al logic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North China.

Key Words: Hebei-Shandong-Henan;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Base Areas; establishment